

書名：《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為例(1916—1949)》

作者：彭淑敏

出版機構：臺北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3年

頁數：417頁

今天學界多從輸入(input)及輸出(output)兩方面衡量研究高等院校的辦學成效。輸入方面分為硬件及軟件。硬件如：財政資助、教職員學歷等人才資源、課程設計、校舍設施及圖書館藏書等；軟件如：學生校園生活、學生組織、課外活動、學生歸屬感、校友會組織等。至於輸出方面，如畢業生成就、師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及為社會創造知識等。豐裕經濟支援，較能為師生提供豐盛的校園生活，以及資助教職員進行更多研究，不能否定的是校方適當地運用經濟資源，較容易培訓人才，錢“財”與人“才”配合得宜，更容易締造一代學風。

很多研究現代中國教育社會學及教育歷史學的學者，已指出民國學術發展的特色，就是高等院校的出現，使學術研究走向專業化、學術化及系統化。其中曾被視為“為帝國主義者服務”的教會大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國內先後興起非基運動及收回教育權時，究竟這些由洋人創辦的高等院校受到了哪些衝擊？教會大學辦學以傳播西方宗教為目的，或是以教學為目的，二者之間有沒有衝突，若沒有衝突，又是怎樣相輔相成？教會大學在非基運動後怎樣在課程上進行“本土化”？教會大學怎樣按各區域的特色，開拓“本土化”的教研工作？尤可以注意者，福建為大儒朱熹故鄉，閩學甚盛，至近代，福

建相繼成立兩所新教育體制的高等院校,分別是南僑陳嘉庚創立的廈門大學及教會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以下簡稱協大)。

協大是民國時十三所教會大學之一,這所由“外來”宗教團體籌辦的大學,怎樣在一塊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甚深的福建,進行本地化作育英才的行政及研究工作,這是甚值得研究的課題。此外,不少學者已指出民國時教會大學既受海外捐款,也受國民政府補助,教會財政較充裕,究竟教會大學怎樣善用及管理財政?近日彭淑敏撰寫《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為例(1916—1949)》一書,清楚及細密地從教會大學的“才”及“財”兩方面,結合社會史及文化史的角度進行研究,為研究教會大學與建立地方學風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域,全書已達到作者所言:“透過師資與財務,體現協大的本土化發展,提供新的觀察視角,從而加深吾人對教會大學於中國社會轉型的歷程中之理解。值得肯定的是,在教育傳教士與華人子弟的西學傳承之師生關係中,見證中國傳統的師道於20世紀的新轉變。傳教士和華人教職員在校政、教學和研究方面,編織了‘傳承’與‘開創’的關係,對促進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福建的高等教育,貢獻甚鉅,亦為中國現代化及21世紀的崛興,提供了歷史根源。”(頁295)深信此書必定成為研究現代福建學風、教會大學和民國高等院校發展史的重要著作。

全書結構除了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外,分為第二章“政歸華人——行政人員”,第三章“任重道遠——教育傳教士”,第四章“培育英才——華人教職員”,第五章“兼容並蓄——財務管理”,正如作者所說:“以福建協和大學現存於中美的原始檔案,並配合口述歷史訪問和實地調查,進而就才、財兩方面入手,進行系統整理,以論述及計量方法,客觀和具體地反映該校的辦學特色與貢獻。”(頁xix)全書以教會大學師資、培養學生的人“才”及收支的“財”務,為論述的重點,甚具特色。

其一,作者運用大量中外教會檔案,成功指出協大的財政管

理與建立學風的關係。正如作者所述：“綜觀中國教會大學以培養人才為宗旨，惟多忽略財務管理的重要性，阻礙教學規模的擴展。”（頁 287）不少學者多注意個別校長善於行政的領導、個別學人的研究成果與學風建立的關係，卻忽視了高等院校籌集財力資助，校方善於理財，得以資助學人進行研究，財力充裕與教研成果甚具互動關係。作者在書中指出英、美基督教差會聯合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自 1916 年成立至 1942 年發展成為私立福建協和大學，並成功運用協和保存了二十一年的福州會計處財務年報，包括收入、支出及資產負債表，研究協大的常年經費，分析協大的收入及支出要項，書中詳細說明了大學財政管理架構及變遷，了解福州董事會與會計處的權責，討論了董事會善於處理捐贈基金及富於投資策略。

同時，作者以 1916 年至 1923 年的財政報告，指出協大成立之初，只以傳教士兼任會計主任，沒有調配資源聘請稱職的簿記員，沒有清晰賬目，致“創辦初年財政緊拙”，“理財不善，經常入不敷支”，“永久校舍建築費嚴重超支”，財政長期拮据，作者未嘗因研究對象為協大，回避該校的財政問題，而是結合堅實的數據，指出“自立案至抗戰遷校前，協大的財務狀況不但達到收支平衡，且出現少量的兌換盈餘”（頁 225）。再者，作者也成功指出協大託事系統地管理財政的課題，由託事部統一收集各差會捐款、個人與團體的贊助及基金收入，再扣除託事部行政費用，餘款根據要求及預算所需，分批匯款至協大，再由協大自行將匯款兌換為本地貨幣。又自 1927 年開始，由公理會和美以美會直接繳付給傳教士的薪金和津貼，統一記入協大財政年報表內，書中除列明除差會捐款外，也列出如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及國民政府教育部等機構的捐款，歸結出 1936 年至 1942 年“中國政府的資助雖從沒有取代海外的辦學資金，但已成為該校戰時教育經費的保障”（頁 240）。

至於支出方面，從作者引用的檔案，可見協大的支出分為營

運支出和資本支出，書中也進一步細分為教育經費、校舍及設備、營運及維修保養、管理及一般支出和緊急及或然支出等，從而指出協大在抗戰時以農學院日漸受到重視，約佔總教育經費百分之二十八，經費充裕，“不但滿足了福建社會的需要，亦發展成為極具地方特色的福建文化研究”之原因(頁 248)。此外，論述中也指出“協大的資本支出主要以建築為主”(頁 250)，作者並細緻地統計出協大資產的資金主要來源是常年經費、教育經費、資本賬目、緊急基金、專用基金及實物捐贈等。從作者的研究足見因為協大完善管理資金和支出，校內的“硬”件設施甚為優厚，雖在抗戰時民生困苦，教員的研究成果及學生的學習仍可以維持一定的水準，達到教研俱備。

任何健全的制度，也會因人事之變動而導致管理架構的變遷。作者運用自 1916 至 1942 年間的檔案資料，指出協大成立之初由英、美傳教士或外籍職員負責該校的財務管理，及至 1928 年協大立案後，設有華人會計助理員管理財務，可見在協大首任華人校長林景潤的執掌下，協大一方面積極向外籌募教育基金，另一方面又能爭取中國政府的捐助，內部也注意財務管理的重要，使協大面對三十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及抗戰時期的經濟困難，仍得以轉危為安。從中也可見教會大學由西教士辦學的模式，漸漸轉向由華人執政，並在校內進行本土化發展的歷程。

更重要的是，不少研究往往因為研究對象，不言被研究者的未盡善之處，本書的研究對象雖是協大財務，作者卻沒有受主觀移情的影響，頗能客觀評價協大行政的優劣。書中指出“在協大創校初年，託事部曾表示該校所提交的財務報告質素差劣，亦缺乏新近的報告”(頁 259)，“浪費了不少人力資源重編賬目”(頁 260)，幸得洋人行政人員畢鶴得及力維積極改革財務管理，不但收支清楚，更有盈餘。其後於 1935 至 1936 年度正式採用基金會計制度，此財政管理制度為 20 世紀現代英美國家管理財

務方法，從中得見協大已能與全球金融管理制度接軌，也按協大“本土”特色，進行保本、穩健及低風險為宗旨的基金投資，因此雖在戰亂時，校方仍可資助不少教研活動。

其二，學校發展除了有賴校舍及校園建設的“硬件”外，更有賴教職員及學生的努力，締造一代學風。本書作者成功地表述學術制度與建構學風的互動關係，讀者閱讀本書可以了解教會“本土化”發展落實在教學制度和師生日常生活中的運作情況。

構成教育之發展，先要看輸入(input)的“人才”方面，對於高等院校的發展，尤重視校長的領導。更重要的是，早期出任教會大學校長的是傳教士(洋人)，但教會大學要有長促發展，必然要進行本土化，研究協大校長的發展情況，正是“了解中國教會大學從傳教士轉移至華人主政的本土化歷程”(頁40)。書中談及校長執掌方面，先詳述美國美以美會西教士高綽(John Franklin Goucher)，為協大首任校長，對學校定名、組織章程、教授科目和課程綱要等，均作出重大貢獻。作者在書中已糾正不少人以為教會大學不重視中國學問的研究，本書指出高綽在任期間，“協大沒有忽略國文教學，邀聘華人出任漢語指導”，時賢如鄭孝觀、陳心陶等更在校內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知識的流播。

然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教會學校行政也進行本土化的發展，林景潤為協大第一位華人校長，林氏秉承協大辦學傳統外，還擴充該校學制和設備，作者更指出“1931年是協大發展的關鍵時刻，成功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註冊立案，轉為私立福建協和學院”，使學校制度更完善，華人教學人數由是大增。相較之下，外籍教員人數較前期為少，仍由傳教士出任行政職位者，也日漸減少。華人職員日漸增多，分別掌管註冊處、教務處、會計處、秘書處及圖書館等。同時，抗戰後的協大，華人教職員已承擔過去教育傳教士的職責，包括行政、教學及研究等工作，“漸由外籍傳教士轉交華人信徒及學者接棒”

(頁 109),而“協大校政上之本土化,至此完成”(頁 101)。

然而,協大進行華人校長及以華人治校的“本土化”辦學後,對教學的影響,也是不少學者希望了解的課題。書中指出華人治校使協大教職員初以福建人士為主,日漸擴至他省,其中不少是協大畢業生。經作者表述,更帶出一個尚待研究的課題,高等院校的發展代表了近代教育已打破地域省籍權力鞏固的功能,漸漸為高等院校學籍所平分,昔日以鄉土士紳為地方權力的核心,他們的權力由血緣及地緣所維繫,這種權力模式漸漸為高等院校的學籍權力架構所取代,不須要同一籍貫,只要就讀在同一高等院校的校友,也可以互相援引。

昔日,不少學者普遍認為教會以教育為媒介,控制中國人的思想,以及教會辦學只是為宗教服務。作者在書中客觀地評價教會大學的辦學成效,以協大為例,既說明西方傳教士對本土教育事業的貢獻,也說明協大傳教士“以培養華人學生為己任,使傳教士與華人學生之間產生了‘新’的異國師生關係”(頁 111),作者列舉傳教士校長莊才偉(Edwin Chester Jones)、高智(John Gowdy),教授何樂益(Lewis Hodous)、克立鵠(Claude Rupert Kellogg)、徐光榮(Roderick Scott)等人,強化協大行政管理及推動中國文化研究,其中克立鵠更倡導在福建進行農村服務工作、農業改良、農村教育、農村衛生、昆蟲學及生物學研究,為協大學生注重農業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學術基礎。徐光榮開辦西方哲學課程,使學生了解基督教及西方哲學思想,他的妻子徐克麗(Agnes Kelly Scott)在校創辦多個音樂團體,既充實校園福音傳播,更充實校園音樂培訓,日後不少學生因受其啓發,在音樂造詣上,均有重要的貢獻。

然而,除了學術成果外,教會大學也注意通過辦學傳播宗教思想。書中既表述教員的研究成果,也注意協大推動福音事業。作者在書中詳細羅列教員在中國及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重要研究成果,也詳述協大設立的宗教委員會,在校園舉辦不少團契

活動，於 1940 年協大學生的宗教信仰之調查報告中，指出校內學生以信仰基督教者為大多數，若以福建一地的情況而言，此尤為重要。因當地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及儒佛思想熏陶甚大，如今協大學生以信仰基督教為大宗，可見協大福音教育的成果。同時，作者指出協大傳教士除了教學外，更為學生扮演了顧問、輔導員及同伴的角色，與學生建立深厚的情誼，這些既推動學生的學術研究，也推動了校園的宗教生活，為近代中國呈現一幅在個人與家庭成員交往以外，宗教人士與教徒交往生活情誼的圖像。

此外，評核一所大學的辦學成效，當然要注意華人教員的行政能力及師生的學術成就。書中詳細闡述 30 年代，協大校政由傳教士轉移至華人校長，如校長林景潤成功轉型教會大學的辦學特色，重視教育與社會實踐，與基督教的信念相契合。陳錫恩校長則勤於著作，關注美國及中國教育改革，而楊昌棟校長多研究農村改革。書中也列出歷任校長提倡研究之風氣及校方提供足夠的資源下，協大師生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如文學院華籍教員有：中國文學專家郭紹虞、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基督教史專家王治心、經學研究學者陳易園及教育史專家陳景磐等，均為學界俊彥。此外，理學院的教員有：生物學學者鄭作新、昆蟲學學者唐仲璋、園藝研究專家李來榮及農業經濟學學者陳興樂等，均為替當時及日後協大和福建學術發展奠基的重要學者。

至於學術成果方面，書中突顯協大出版的學術刊物如《福建文化》、《協大農報》及《協大生物學報》等，為師生提供發表研究成果的平臺，推動福建地域歷史文化及農業的研究風尚。協大師生把研究成果植根在福建，並培育海峽兩岸及國際學術界研究福建領域的人才。由此可見，協大的傳教士既“具有宣教的呼召”，也有“豐富的行政與教學經驗，對於近代福建新教育的發展，貢獻良多”（頁 111），也可以引證在華人領導下協大學術成果之興盛，正如作者所言：“協大傳教士和華人教職員在校政、教學及研究編織‘傳承’與‘開創’的關係，華人教職員一方

面延續傳教士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創新與突破,集教學、科研與應用於一身,為20世紀上半葉福建的高等教育立下重要的里程碑。”(頁222)誠非空論!

《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為例(1916—1949)》一書開拓了教會大學“才”與“財”配合研究的成果。然而,若深化福建一地教會大學的研究,尚可注意：一、福建一地素受中國傳統佛教、傳統民間宗教及儒家文化所熏陶,如今教會大學成立之初,怎樣與本土中國傳統文化融合,若深化這方面的研究,更可見近代中國的教會大學,與西方宗教的關係,既從被排拒至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歷程,由此也見教會大學從中西文化相交往及融合的橋樑,至為中國本地化教學和行政作出貢獻的歷程,此將有助了解及開拓研究教會辦學在近現代中國高等院校走向中國現代性的路途上,所扮演的角色。二、作者在書中所言福建民俗學的研究學風與協大、早期任教的傳教士,甚有關係,我們也可以多注意二三十年代,研究民俗學的北方重鎮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方的重鎮為中山大學,但協大推動福建本土民俗學的研究,與其時“主流”民俗學的成果,有哪些異同?傳教士傳入的民俗學與南北二地研究的風尚有哪些異同?同時,今天尚未有太多學者研究傳教士對中國民俗學發展的影響,此更是有一個有待開發的課題。

誠然《民國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以師資和財務為例(1916—1949)》一書,作者在堅實的史料支持下,開拓了結合近現代福建學術史、高等教育史及教會史多元互動的研究成果。作者更運用大量中外檔案,列出詳細的統計圖表,論證詳實,亦可見作者擷取資料的識力及心思細密。作者在書中成功證明教會大學人才善用與善於籌劃財力的關係,並由此促成學人研究成果層層推新,這種結合“才”與“財”的研究方向,將會為學界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區志堅)